

MF

MODERN FINANCE SERIES

现代金融译丛

金融理论系列

七十年后再读 凯恩斯通论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罗伯特 W. 狄蒙德 (Robert W. Dimand)

罗伯特 A. 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

/ 编

亚历山德罗 维尔切利 (Alessandro Vercelli)

王汉昆/译

宋 焱/校

1936年2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尽管它对宏观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很多饱受争议的内容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06年7月3日至6日，在锡耶纳圣塔科伦坡的蒙代尔宫，全球顶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和宏观经济学家齐聚一堂，共同纪念《通论》出版七十周年，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凯恩斯及其《通论》做出了全新的解读。

 中国金融出版社

MF

MODERN FINANCE SERIES

现代金融译丛

金融理论系列

七十年后再读 凯恩斯通论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罗伯特 W. 狄蒙德 (Robert W. Dimand)

罗伯特 A. 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

亚历山德罗 维尔切利 (Alessandro Vercelli)

/ 编

王汉昆/译

宋 焱/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为 赵天朗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by Robert Dimand, Robert Mundell and Alessandro Vercelli.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he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北京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10 - 8167

《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中国金融出版社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 (Qishinian hou Zaidu Kaiensi Tonglun) / 狄蒙德, 蒙代尔, 维尔切利编; 王汉昆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1

(现代金融译丛)

书名原文: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ISBN 978 - 7 - 5049 - 6203 - 4

I. ①七… II. ①狄…②蒙…③维…④王… III. ①凯恩斯主义—研究
IV. ①F091. 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033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8.25

字数 281 千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6203 - 4/F. 5763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现代金融译丛》编委会

主任：苏宁

副主任：金琦 魏革军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志杰 马君潞 王稳 王璐
王治超 祁斌 李葭 杨再平
肖远企 张健华 陈雨露 周道许
孟龙 赵天朗 查子安 康以同
韩明智 焦瑾璞 谢多

编者的话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和经济结构的总和。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现代金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变迁和格局。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再到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从繁荣到危机的更替，西方金融理论也一步一步从古典走向现代。现代金融尤其是西方金融理论经历了百年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人类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迈出的重大一步。金融理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实践的深入都极大地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民生显著改善。2007年，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均GDP超过2300美元，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正向世界彰显出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绩。中国金融业在改革中稳步、健康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更加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业逐步加强，对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工作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研究金融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切实保障金融安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增强金融业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做好金融工作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并在全球化时代下不断发展和进步，但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复杂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既面临机遇也遭遇挑战，需要广大金融从业者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西方金融体系陷入危机，许多拥有百年历史的银行顷刻倒闭。西方的金融体制再一次暴露出致命的缺陷，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金融体制的科学安排。在复杂的全球化金融环境中，中国也需要独立地思考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中国要继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金融建设同样要依据国情，总结出有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但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孤立完成，中国的特色发展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我们一方面应该认真学习、研究先进的金融理论，探讨发达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实践，了解现代金融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现代金融理论的内在本质，对金融理论及其衍生的金融实践作出理性研判，做到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为此，中国金融出版社计划推出《现代金融译丛》，旨在引进近年来国外在金融理论、金融管理、金融实践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为读者介绍先进的金融理念，引导读者关注最新的金融动态。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为广大读者奉上当今世界金融领域中前沿、经典、独到的学术盛宴，也期望决策者、治学者能够高举科学发展的伟大旗帜，吸收一切有益的理论 and 经验，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所有为丛书出版而辛勤工作的人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丛书的编者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仔细、严格的甄选，感谢丛书各位译者字斟句酌的翻译，感谢丛书编辑与校对人员密切协调配合，也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现代金融译丛》编委会

2009年4月

作者简介

罗杰·E. 巴克豪斯 (Roger E. Backhouse) 是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哲学学院的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生活的日常事务/西方经济史 (企鹅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企鹅图书, 2002), 《剑桥哲学指南——凯恩斯》(与布莱德利·巴特曼合编,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6), 《1945 年以来的社会科学史》(与菲利普·芳登合编,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

布莱德利·W. 巴特曼 (Bradley W. Bateman) 是丹尼森大学的教务长和执行副校长。他是《凯恩斯的不确定性革命》一书的作者, 与罗杰·巴克豪斯合编了《剑桥经济学指南——凯恩斯》一书。他对美国经济学施加宗教影响的作品出现在许多杂志上, 包括《经济展望杂志》、《政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杂志》。他正在写作的一本书是有关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早期, 宗教在美国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及随后这一学科是如何变得世俗化的。

理查德·N. 库珀 (Richard N. Cooper) 是哈佛大学 Maurits Boas 国际经济学教授。从 1963 年至 1977 年, 他在耶鲁大学任教, 同时从事着几项公共服务, 包括经济事务部的副部长,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保罗·戴维森 (Raul Davidson) 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和伯纳德·施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的访问学者。他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的编辑,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书的作者 (麦克米伦出版社, 经济学界的伟大思想家, 2007), 他是另外 21 本书的作者、合著者或编辑, 写作了 200 多篇论文。

米歇尔·弗罗埃 (Michel De Vroey) 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教授, 是《非自愿失业: 难以理解的理论探索》(罗特里奇出版社, 2004) 一书的作者。他正在写作的一本书是有关宏观经济学历史的, 针对这一主题, 他已发表了

大量文章。他在巴黎索邦大学、杜克大学、克莱姆森大学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都拥有访学身份。

罗伯特·W. 狄蒙德 (Robert W. Dimand) 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是《凯恩斯革命的起源》(埃尔加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一书的作者, 是《博弈理论的历史, 第1卷: 从开始至1945年》(罗特里奇出版社, 1996) 一书的合著者, 是《女性经济学家辞典》(埃尔加出版社, 2000) 一书的合编者, 是《宏观经济学起源》(包括10卷, 罗特里奇出版社, 2004) 一书的编辑。他曾经是康涅狄格大学、巴黎第二大学和第戎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目前正在写作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界的伟大思想家》之詹姆斯·托宾卷。

吉勒·多斯塔莱 (Gilles Dostaler) 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经济思想史。他的写作对象涉及了大量的学者, 包括凯恩斯、哈耶克、马克思和其他著名的思想家。在其他的作品当中, 他已经出版了《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思想》(与米歇尔·博得合著, 埃尔加出版社, 1995, 罗特里奇出版社, 1997),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法国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 2001), 《凯恩斯和他的战役》(埃尔加出版社, 2007), 《资本主义和死神》(与贝尔纳·马里斯合著,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2009) 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凯恩斯》(Thierry Magnier 出版社, 2009)。

希拉·C. 道琼斯 (Sheila C. Dow) 是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她(与亚历山大·道琼斯)合编了《苏格兰的经济思想史》(罗特里奇出版社, 2006)。她的著作包括《经济学方法论: 一种探索》(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宏观经济思想方法论》(埃尔加出版社, 1996) 和其他有关方法论、经济思想史、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理论和区域金融方面的出版物。她是《经济学方法论杂志》的副主编和英国下议院财政特别委员会的货币政策特别顾问。

马修·福斯塔德 (Mathew Forstater) 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经济学和黑人学副教授, 是该校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小书大思想: 话说经济》(2007) 一书的作者, (与L. 兰德尔·乌雷) 合编了

《二十一世纪的凯恩斯》（麦克米伦出版社，2008）一书。

雪莉·戴维斯·卡斯帕（Sherry Davis Kasper）是田纳西州玛丽维尔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她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对它的先驱者的个案研究》（埃尔加出版社，2002）一书的作者。她近期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知识话语的文明。

玛莉亚·克里斯蒂娜·马尔库佐（Maria Cristina Marcuzzo）在米兰大学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是罗马 La Sapienza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目前是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的会长。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古典货币理论（《李嘉图和金本位制》一书的合著者，1991）和经济学的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的经济学》一书的合编者，1996；《剑桥经济学家》一书的合编者，2005；同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目前她正在编辑她以凯恩斯为主题写作的论文集。

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包括《国际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Goodyear 出版社，1971）以及《二十世纪的再思考》一文（诺奖演讲，美国经济评论，2000）。

爱德华·J·内尔（Edward J. Nell）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曾经在卫斯理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任教，是不莱梅大学、巴黎大学、罗马大学、锡耶纳大学、新奥尔良大学和尼斯大学的客座教授。莱尔曼研究所的研究员，巴德中心研究员，发达经济体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教员，他写作的书籍包括《理性经济人》（与马丁·霍里斯合著，1975）、《繁荣与公共支出》（1988）、《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凯恩斯》（1990）以及《变革增长与有效需求》（1992）。他编辑的书籍包括《增长、利润和产权》（1980）和《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1984）。

埃德蒙德·S·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年出生于芝加哥，1955年在阿姆赫斯特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5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经执教

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他创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他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2009年，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爵士、米兰多拉奖、基尔世界经济奖等多项荣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设立了菲尔普斯讲座教授。2001年，为表彰他的成就召开了纪念论文大会。

科林·罗杰斯（Colin Rogers）拥有南非大学的商业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货币理论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和凯恩斯经济学。他的作品强调了有效需求原则在理解凯恩斯《通论》中货币力量 and 实际力量整合的重要性，包括《货币、利息和资本：对货币理论基础的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和《通论“第二版”》（合编者包括哈考特和雷契，劳特里奇，1997）中的一章。

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Alessandro Vercelli）是锡耶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凯恩斯和卢卡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的作者，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策略的调查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的合编者。

L. 兰德尔·乌雷（L. Randall Wray）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是该校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是美国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的高级学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师从海曼·明斯基时，乌雷的研究重点是货币理论和政策、宏观经济学、金融不稳定性和就业政策。他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关键》（埃尔加出版社，1998）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和信用》（埃尔加出版社，1990）两本书的作者，是《货币的信用和状态理论》（埃尔加出版社，2004）一书的编者。乌雷在太平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前 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未停止过吸引一批又一批宏观经济学家，这些人中既有他的拥趸，又有他的反对者，还有那些致力于从他及前人的理论思想中吸取精华的中立派。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在此意义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符合约瑟夫·熊彼特对伟大思想的定义：大多数想法会在一定时间内消亡，短则饭后片刻，长则影响一代人；但伟大的思想却会不断卷土重来，并非以一种几不可辨的意识流形态存在，而是会采取一种显著的姿态。

1936年2月，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端。宏观经济学得以打破货币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桎梏，由单纯地继承研究成果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自此之后，宏观经济学围绕凯恩斯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论而展开。这些问题包括：总产出和就业如何决定？经济能否实现自发调节？政府是否有责任运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波动，抑或政府自身就是引发经济不稳定的根源？货币经济形态与物物交换形态有何不同？就凯恩斯的理论遗留问题（Keynes's legacy）和凯恩斯革命的本质，理论界至今仍然存在激烈争论：凯恩斯革命究竟是对经济理论的革命，还是对经济学方法论、公共政策抑或理论假设的革命？

《通论》出版70周年纪念日，适逢与凯恩斯首次造访锡耶纳100周年纪念日。为此，意大利锡耶纳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慷慨解囊，赞助国际经济协会（IEA）与锡耶纳大学联合举办了“70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国际研讨会。2006年7月3日至6日，在锡耶纳斯塔科伦坡（Santa Colomba）蒙代尔宫，来自全球许多国家的众多凯恩斯主义研究者和知名宏观经济学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凯恩斯的理论贡献，其作为民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影响及《通论》中诸多饱受争论的理论遗留问题。

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学的布莱德利·巴特曼（Bradley Bateman）和伯明翰大学的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提出了“谁的凯恩斯？”这一论题，其共同编写的《剑桥哲学指南：凯恩斯》（2006）一书，将对该问题的

研究引入高潮。在书中，巴特曼和巴克豪斯以质疑的口吻评价了凯恩斯的后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一连几代学者”为了支撑自身观点而竞相援引凯恩斯的权威性，尤其是《通论》的权威性。他们同时指出，“凯恩斯的学派归属问题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做一件凯恩斯从未尝试，甚至可能刻意规避的事情，即重新开创一门正统学派。”

与其他“已故经济学家”不同，凯恩斯的一生富足无忧且充满传奇色彩。他因此成为多部人物传记巨著的主角。这些人物传记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知识性和娱乐性，其中包括由凯恩斯的友人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为其撰写的第一部传记、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几年前的作品及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撰写的厚达三卷的《凯恩斯传》。难以想象，除凯恩斯之外，还有哪位经济学家拥有如此魅力，能够吸引普通读者购买厚达三册的鸿篇巨著并透过书本去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爱情和思想。同样，也再无其他经济学家有此殊荣，能够以“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来命名自己的个人传记。

罗马第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me “La Sapienza”）的玛莉亚·克里斯蒂娜·马尔库佐（Maria Cristina Marcuzzo），目前正在主导一项关于剑桥经济学家往来信函的大型研究项目。他细致比较了不同传记作者对《通论》的介绍方式：莫格里奇的文风近似于一位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专业史学家，哈罗德像是一位致力于某个研究项目的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则更加接近于20世纪的英国史学家。

凯恩斯的妻子，芭蕾舞演员丽蒂亚·罗波可娃（Lydia Lopokova），借由丈夫结识了许多经济学家。在写给婆婆的信中，她这样描述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聊至极，缺乏开阔的眼界，缺乏对生活的感悟，更遑论伟大的思想。他们不应该治理国家，但梅纳德例外，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引自斯基德尔斯基 1988，第 161 页）。的确，梅纳德并不是一个固守“象牙塔”的学者，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本书随后两章探讨了凯恩斯如何演绎政治经济学家这一角色。田纳西州玛丽维尔大学的雪莉·戴维斯·卡斯帕（Sherry Davis Kasper）认为，凯恩斯实质上扮演了民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角色；她同时还探讨了为何“在凯恩斯之后，只有少数经济学家追随他的脚步，就改变公众观念的程度而言，或许只有弗里德曼才能与之相提并论”。锡耶纳大学的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Alessandro Vercelli）

引用了凯恩斯的名言“研究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他提出，凯恩斯在《通论》中划分了“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s）学派并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虽然这一划分饱受诟病，但事实上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继亚当·斯密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持的一脉相承（common thread）的观点：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接受“萨伊定律”（Say's law）这一理论假设，即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可能性。凯恩斯不仅否定了萨伊定律，而且划分了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但他却并未否定古典自由主义的其他基本原则。尽管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常常被指责为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旨，但维尔切利教授为其辩称，《通论》应该被认为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根本性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的新问题，这一重要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尤为显著。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S. 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其“法团主义（corporatism）与凯恩斯：有关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文中，分析了凯恩斯早期作为“合作主义者”（early “corporatist”）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不满，这一论题与此前提及的维尔切利的章节密切相关。凯恩斯和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主张：无论何时何地都工作是人们的次优选择（inferior good），随着整个社会接近“拉姆齐极乐状态”（Ramseyan bliss），每周工作时间将被缩减至极低水平（next to nothing），菲尔普斯对此极为不赞同。

无论是凯恩斯的个人兴趣，还是他的社会影响，都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学领域。《凯恩斯和他的战役（2007）》一书的作者，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的吉勒·多斯塔莱（Gilles Dostaler）在书中展示了凯恩斯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视文学创作为一门艺术的杰出作家、见地独到的美学家、我行我素的艺术家。

堪萨斯城密苏里州大学的马修·福斯塔德（Mathew Forstater）认为，凯恩斯对社会学的贡献和影响远在宏观经济学之上，其所涉猎的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对经济人类学和比较制度学（comparative systems）予以特别关注。福斯塔德写道：

凯恩斯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援引海尔布隆纳的话来定义，他是一位“老于世故的哲学家”。凯恩斯在研究中运用了而今所谓的“跨学科”方法，这并非出于他的标新立异，而是由于他意识到了过度专注于社会科学的危险，并以此作为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的唯一途径。

国际货币经济学领域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理查德·N. 库珀（Richard

N. Cooper) 教授, 著有《国际金融学》一书。该书被收录于“企鹅丛书”(penguin volume of readings), 成为家喻户晓的必读经典。库珀强调,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其中只有一个方面存在局限性, 即《通论》中所采取的封闭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为了证明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库珀转而研究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就贸易和工业萧条问题, 于 1886 年向皇家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证词。库珀认为, 该证词充分显示出马歇尔过人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 但却“缺乏我们经济学家视为理所当然的方法论, 即缺乏对宏观经济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综观分析, 这些组成部分包括投资、消费和贸易平衡等等”。

阿德莱德大学的科林·罗杰斯 (Colin Rogers) 强调,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是理解《通论》中革命性内容 (revolutionary message) 的关键。由于凯恩斯主义者均承认《通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特例, 而非对经济学理论的彻底变革, 这一共识招致了对凯恩斯研究方法的诸多批判。批判者认为, 凯恩斯主义者把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从而将宏观经济研究拖回到了微观分析、代表性主体分析 (representative agent) 和不包含货币因素的真实经济周期均衡分析等传统范式之中。因此, 尽管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货币分析的关键性内容, 但其在凯恩斯主义现实分析 (Keynesian Real Analysis) 中却无从落脚。

鲁汶大学的米歇尔·弗罗埃 (Michel De Vroey) 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现代宏观经济学是否已经逾越了凯恩斯主义? 抑或它只是回避了凯恩斯提出的一些问题, 并且忘却了仍有另一些问题尚待解答? 为了研究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至今的演进, 弗罗埃运用二维网格分析法 (a grid of analysis) 进行了两项比较: 一是对新古典主义中的马歇尔学派与瓦尔拉斯均衡学派 (Marshall - Walras divide) 的比较; 另一项比较则针对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 (conceptual apparatus) 和政策动机 (policy cause) 而展开。弗罗埃同时追问宏观经济学家是否真的已经抛弃了凯恩斯主义? 基于自身的研究, 他认为, 如果仅就方法论而言, 答案是肯定的。但就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动机而言, 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 凯恩斯主义政策动机如今已日渐成熟。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 已经不再执著于最初的雄心壮志, 而是从证明市场失灵 (尤其是非自愿失业) 存在性的努力中解脱出来, 确立了一个更为中规中矩的目标: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引入市场的不完美性 (bringing imperfections to the forefront)。

在“总需求、就业和边际生产率均衡: 手工业经济下 (Craft Economy) 的凯恩斯主义调节”一文中, 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爱德华·J. 内尔 (Edward J.

Nell) 探讨了凯恩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内尔指出, 尽管凯恩斯接受“古典经济学第一假设”, 认为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并且同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第二假设”, 即实际工资的效用等于既定就业水平上的边际负效用; 但他却坚持认为工资是由货币工资而非实际产出所决定。为此, 内尔质疑: “如果市场是由货币工资所推动运行的, 那么实际工资应该与边际产出达到何种程度的吻合? 如果实际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所确定的, 为何不能据此实现充分就业? 当在‘均衡’的状态下存在失业时, 其影响为何如此深远和持久?” 根据凯恩斯在几次讲座中所提及的内容, 内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强调, 实际工资可以在多种就业水平上与劳动的边际产出达到一致; 当投资和消费同时发生变化时, 投资的波动将会引起一系列失衡变化, 而不是调整经济重回特殊的均衡状态。

此外, 本书还收集了两篇从货币经济角度分析《通论》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 堪萨斯大学密苏里分校和利维经济研究所的 L. 兰德尔·乌雷 (L. Randall Wray), 在文中指出, 凯恩斯 (1936) 在研究货币问题上采用了两种自相矛盾的方法: 一种是货币供求均衡模型分析 (《通论》第 13、第 15 章), 即传统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方法; 另一种是资产价格决定中的流动性偏好法 (《通论》第 17 章)。乌雷认为, 后者与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方法一致, 从而对于我们理解货币在引发失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另一篇论文的作者, 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保罗·戴维森 (Paul Davidson), 任《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的编辑, 同时也是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的伟大思想家”系列丛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007)》分卷的作者。他注意到阿罗 (Arrow) 和哈恩 (Hahn) (1971, p. 357) 的一则声明: “如果要写作一部严肃的货币理论, 那么基于货币条件而订立合同这一前提, 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戴维森认为,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早期的货币理论不同, 它不仅符合阿罗和哈恩对“严肃”的定义, 而且对先前的经济学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凯恩斯的分析引入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 放松了固定的货币工资这一条件, 而仅仅要求经济以货币形态存在, 各经济主体之间依据货币条件订立合约。

斯特灵大学的希拉·C. 道琼斯 (Sheila C. Dow) 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上看, 还不存在一场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相一致的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凯恩斯革命。”不过, 她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仍可以遵从凯恩斯的主张进行变革, 即伴随其他的

(不相称的) 论证形式, 正式的论证只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然而, 将这些新证据 (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所提出的行为类型, 融入理性公理之中, 却绝非易事。正如现实已经证明的一样, 将模型的不确定性真正融入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在一个非确定性的社会系统之中, 凯恩斯的思维方式解决了我们所面临的真实行为和真实认知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能够 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认真对待, 凯恩斯的思维方式如果得以采用, 那么一场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凯恩斯革命仍有可能爆发。

宏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 从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周期分析中吸取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财富。尽管如此, 布鲁克大学的罗伯特·狄蒙德 (Robert Dimand) 仍坚持认为, 《通论》凝结了凯恩斯的学术贡献和大量综合分析, 它的问世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功不可没。凯恩斯及其拥护者确立了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既研究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 又考虑了预期、不确定性和投资的波动性等因素, 同时还解释了为何劳动力市场可能无法实现出清 (《通论》第 19 章中的动态分析), 以及名义冲击为何会影响真实产出。这四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如果断章取义地将其中某一方面视做凯恩斯理论的精髓, 势必会削弱其强大的综合分析能力。在《通论》出版之前, 凯恩斯本人及其他学者已经对失业、货币的短期非中性等问题多有著述, 但《通论》却赋予宏观经济学一个新的视角: 研究收入和就业实现均衡的决定因素——一个区别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周期分析和货币数量理论的全新课题。正如狄蒙德所言, 这是一场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

参考文献

- Arrow, Kenneth J. and Hahn, Frank H.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and Edinburgh: Oliver & Boyd.
- Backhouse, Roger E. and Bradley W. Bateman, eds. 200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yn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dson, Paul. 2007.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Dostaler, Gilles. 2007. *Keynes and His Battle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Skidelsky, Robert. 1988. "Some aspects of Keynes the man," in Omar F. Hamouda and John N. Smithin, eds., *Keynes and Public Policy After Fifty Years*, Vol. 1. 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致 谢

我们非常感谢意大利西雅那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对国际经济协会（IEA）在2006年7月3日至6日召开的“70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这一国际会议的慷慨赞助。感谢锡耶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ena）对这次会议的支持。感谢 Valerie Natzios 和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本次会议的召开地——圣塔科伦坡（Santa Colomba）的蒙代尔宫（Palazzo Mundell）对我们的热情款待。除了收集在本书中的那些更正式的论文，参会人员荣幸地听取了洛厄尔·哈里斯（C. Lowell Harris）教授关于1937年凯恩斯《通论》如何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认可的回忆。当时哈里斯教授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学业。我们感谢 Fay Sun 为本书整理索引时付出的努力。同时也要感谢锡耶纳这个城市：除了纪念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了七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凯恩斯访问锡耶纳的一百周年，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为何对锡耶纳和托斯卡纳感到如此满意。